

隔代无仇:布波文化融合的社会基础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布尔迪厄认为阶级与文化之间是相互强化的,吉尔茨认为文化是传承的,根据这个逻辑,两个敌对的阶级和文化是不可能和解的。布鲁克斯提供了一个反例,曾经敌对的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如今已经合流为融合了二者特征的布波族,并因此构成了对布尔迪厄和吉尔茨命题的挑战。对布、波的分析表明,阶级与文化之间相互强化以及文化传承的基础是阶级的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社会基础的阶级之间是无法进行文化与阶级的相互强化和文化传承的,布波族之所以融合了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阶级和文化特征,是因为它与后者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自然也就没有继承二者之间的敌对。

关键词: 文化;文化融合;社会基础;布波族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4)06-0134-10

一、引言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在文化与阶级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力量,由经济地位所区隔的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化上产生系统的区隔;文化的区隔反过来也会产生阶级的结构,并使阶级之间的区隔形式化。[1]而按照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说法,文化的意义系统是代代相传的,所谓经验模式只不过是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倾向,一种文化的强调,被他们制服的对立面,在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中也同样有根基,也同时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对立的经验模式和文化总是共存的和相互强化的。[2]如果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看,无论是在截面的、还是在历时的意义上,文化与阶级是关联的,两者之间是相互强化的,阶级的或文化的对立应该也是代代相传的。这样,我们就很难想象相互敌对的阶级之间如何能在文化上相互融合,但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著作《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阶级和文化融合的例子。[3]

艺术家曾经是波希米亚(bohemian)的代表

银行家则是布尔乔亚(bourgeois)的代表,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之间的对立历史上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布鲁克斯告诉读者,“现在,要把啜饮浓缩咖啡的艺术家和猛灌卡布奇诺咖啡的银行家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不只是流行配件的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布鲁克斯通过调查布波族“对性、道德、休闲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提出“要区分反现有体制的叛逆分子和拥护现有体制的公司人越来越不容易。大部分人,至少大学毕业的那些人,既叛逆不羁,又夤缘上爬。抛开期望和逻辑不谈,现在的人似乎已经把反叛文化的20世纪60年代和积极进取的80年代融合成单一的社会风气了”[3](前言)。这群无法区分的人,就是布鲁克斯所说的“Bobos”^①,即把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字头合起来的称呼。《布波族》不仅肖像式地刻画了这个新的上流阶级的基本特征,更从消费、商业生活、学术生活、享乐、心灵生活和政治生活等六个方面展示了这个新阶级的生活实践、文化和意识形态。

不过,对布鲁克斯的描述,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自《布波族》2000年出版以来,有关该书主题和事实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在美国,因为一部非学术、却似学术的著作而出现这样广

收稿日期:2004-06-16

作者简介:邱泽奇(1962—),男,湖北仙桃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① 在中文的翻译中,一译为“波波族”,一译为“布波族”,本文以徐子超翻译的中文书名为准。

泛、持久和激烈的争议,是很少见的。^①仅这个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布波族》触及了人们关注的、却又把握不住的问题。正如哈勃(R. Eugene Harper)说“这却是一本每个社会科学的学生都应该阅读的书,因为这本书为解释美国文化提供了另一条非常有潜力的思路”。

尽管我们不希望陷入漫无边际的问题争论,但也不能回避一些基本的事实,如是否存在一个可以感知的布波族。否则,所有的讨论就真可能像有的批评者引述萨诺扬(William Saroyan)所说的那样,“没有了基础,所有的建筑都会轰然倒塌”[4]。

如果我们认同新的上流阶级——布波族的存在,那么布波族的出现本身,“其实是一个深远的文化转移的征兆”[3](P60),对文化融和的探讨就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的融合,甚至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检验民族之间多元一体的机制。这样,在布鲁克斯自称的这种“喜剧社会学”里,更为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文化何以能相互融合,进而建构一个兼具曾经敌对阶级文化特征的新阶级文化。

二、有一个布波族吗?

针对《布波族》陈述的事实,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沃尔夫(Alan Wolfe)在保守主义的媒体上说,“《布波族》是一本理想的布波书”。在19世纪的法国,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确有过尖锐的对立,但在21世纪的美国,他们已经同舟共济了。如果从事实的层面来看,布鲁克斯对布波族的描写不是太过夸张,而是太过不足和太过谦虚。“布波主义不是美国生活的缩影,简直就是美国生活的全部。”[5]韦弗林(Christopher Wavrin)也认为,的确存在一个精英阶层,“尽管2000万布波族在美国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他们却是美国社会的精英,他们是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上流阶级”[6]。但梅特卡夫(Roy Metcalf)却认为,“几乎所有的描写都是凭空想象的”,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梦幻般的精英阶层。[4]

舒伯(Diana Schaub)则认为,即使有一个不同于布尔乔亚的新精英阶层,那也不是布鲁克斯所说的布波族,因为布鲁克斯所说的布波族更像是

布尔乔亚对波希米亚的“一种敌意的收购……所产生不是布波族,而应该是人造的东西(Faux-bos)。如果我们的良心因为自己对艺术、哲学和社会行为的假意喜好而得到安慰的话,那就等于宣告了我们自己的浅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坦然承认具有高度文明的布尔乔亚在把波希米亚的批评进行内化的时候仍然饱受自我厌恶的煎熬。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说明在现代性内部洛克与卢梭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即使布尔乔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快乐,也不意味着这样的快乐是可以打包带走的,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地狱而不是天堂。”换句话说,与其说新精英阶层是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合并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或人类永恒人性的现代表现,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社会的自由精神生活始终就是存在的”[7]。

弗斯通(Ransall S. Firestone)进一步指出,姑且不谈书中的现象是否可信,重要的是“信息时代并不是布波族创造的。”因为,在所谓的布波族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之前,信息时代就已经进入了发展的轨道。[8]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想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

针对《布波族》的观点,非常有意思的是,相关的评论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布鲁克斯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甚至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其原工作所在的《标准周刊》也是旗帜鲜明的保守主义媒体,保守主义者却认为他是美国左派的产物[5],而真正的左派却尽其所能地用讽刺的语言说明布鲁克斯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描述了一群保守主义的布波族,而他们的精神实际来自于18世纪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柏克(Edmund Burke)。[4]

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播学和社会学教授吉特林(Todd Gitlin)则引用布鲁克斯在2002年6月《标准周刊》的编者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布鲁克斯说:“保守主义者,甚至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总统都已经失去了他们当初的热情,变成了社团主义者。”换句话说,吉特林似乎同意布鲁克斯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认为现在的左派和右派的界限不那么容易分辨。史蒂文森(Richard W. Stevenson)也认为布鲁克斯是对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在向对方挑战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对方的意见,并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9]加兰特(Debra Galant)

^① 仅《纽约时报》系的媒体,从2000年到2003年至少刊出了5篇有关该书的评论或报道。

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以“左派的思想,右派的生活?”为题,更是明确地表述了区分左右的迷惑。^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又想起了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早在1960年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 这所谓的中间路线与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什么不同[9],重要的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说到布波族对社会的影响,也有着不同的观点。韦弗林认为,是“布波族……左右了这个时代,他们是新的主流群体,他们的杂交文化是我们的呼吸,他们的地位符号主导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他们的道德符号提供了我们个人生活的框架”[6]。

而梅特卡夫则诘问,“陆虎”(Land Rover)原是大型的越野车,布波族为什么要在高速公路上开“陆虎”并因此给其他开小型车的人带来不安全感呢?为什么上超级市场也要开“陆虎”,并因此给其他顾客停车带来不便呢?[4] 弗斯通更是指出:“从许多方面来看,对于布波族而言,他们所谓的社会良知更多的是一种口头表达,而不是一种社会实践。尽管布波族关注环境和能源,可是他们并不关注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美国只有20%的成年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有机会成为布波族,那么另外的80%呢?更重要的是,布波族根本就没有试图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消耗了世界上最大比例的资源,甚至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了。”[8]

更有甚者,夸克(Michael Quirk)指出,与其说布波族结合了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高尚品德,不如说沾染了他们的恶习,布波世界决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而是一个恶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介乎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之外的第三种文化。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布鲁克斯所说的那些疯话。[11] 布鲁克斯说,如果布波族把自己的眼光放大来关注一些更加宏大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有能力在历史上形成一个阶级并带领美国进入另一个黄金时代。[3] (P307) 夸克认为,这纯粹是布鲁克斯片面的、感性的、粗糙的观察,这些话也只能自欺欺人。[11]

更多讨论不宜足论,这些已经反映《布波族》一书所带来的影响了。纵观各类评论,尽管有人对是否存在一个布鲁克斯所说的布波族有争议,但否定的声音实在过于弱小,更多的争论集中在

了作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布波族与美国社会的关系方面。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布鲁克斯对布波族的刻画并不是空穴来风。

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简称“沃士波”)住的高级住宅郊区忽然点缀着附庸风雅的咖啡店,里头的人们啜饮着小杯的欧式咖啡,听着另类音乐。同时,波希米亚的市中心社区则充满了百万价位的挑高楼层和高档园艺商店,里头卖的小铲子可能要花上你三百多元。……等级的规则似乎完全颠倒了。[3] (P1)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已经认可了布鲁克斯的概括,承认在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的确存在一个新的精英阶级。不然,奥多恩(Cristina Odone)就不会在多层意义上把现任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称为布波族,并认为他所推崇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道路”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12] 不仅如此,卡内基梅隆大学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教授在2001年成稿的文章中更是运用统计数据证实了波希米亚的环境对其他高智力人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这类人才反过来又强烈地吸引和产生了强大的创新力量,说明了波希米亚指标与高智力人才以及波希米亚指标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接着,佛罗里达教授出版了新书《创新阶级的崛起》。在这部《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ton Monthly)2003年度政治类获奖图书、全美畅销书(National Bestseller)中,佛罗里达展示布鲁克斯所说的布波族的创新风潮正像20世纪50年代怀特(William H. Jr Whyte)在《组织人》中展现的组织风潮席卷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一样,在逐步主宰我们今天的生活。如前所述,布鲁克斯估计布波族的人口大约在二千万左右,佛罗里达更加乐观,认为他的“创新阶级”的人口在3800万,已经占据了美国整个劳动人口的30%,这部分人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更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13]

如果我们接受布鲁克斯和佛罗里达的判断,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布波族恰恰是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的融合,而不是其他?换句话说,为什么布波族拥有的是布尔乔亚身体和波希米亚的精神或

① 此外,加兰特还设计了15道题,人们可以用这些题进行自我测试,看自己是否是布波族。参见 Galant, Debra. *Think Left, Live Right? Hello, Bobo*. The New York Times 2000 June 25pp. 14N.J. 1.

是相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追溯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本身。

三、作为阶级符号的文化与布、波

“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歧义性之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往往从不同的来源选择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定义,并常常因此使得“文化”变成一个不可讨论和对话的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众多学科对文化的讨论始终兴而不衰,原因在于“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在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上所引起的许多重要与持续反应”[13](pxvii)。

正因为如此,在两个多世纪的讨论中也逐步形成了一些共识。譬如人类学家更愿意在历史传承的意义上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或意义体系。一如格尔茨所说,“文化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用符号表达的意义模式,是一种用符号表达的观念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人们得以沟通、传承和发展他们的生活知识和生活态度”[2](P89)。

社会学家则更愿意在社会的层面上把文化看作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形态,如所谓的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并在操作层面上把文化与物质、观念进行关联,如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一如约翰·霍尔和玛丽·尼兹所说,“文化包括:(1)思想、知识(正确的、错误的和未经证实的)和处事规则(recipes);(2)人工制造的工具(如铲、缝纫机和计算机等);(3)社会行动所产生的产品,并且能为进一步的社会生活发展所利用(如苹果派、电视机、州际高速公路等)”[14](P19)。

而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文化的)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一种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之完美的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的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指‘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整个生活方式’”[13](pxvii)。

比较上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界定就会发现,“文化”几乎涵盖了人类整个的心智和物质生活及其后果,“关切各种新的人际与社会关系”[13](pxx),进而使得人们在没有界定的条件下就无法进行任何的讨论。为此,我们更愿意回到“文化”的本源意义上,牢记这个源于

拉丁文 colere 的文字所携带的耕耘、培育、养成、成长等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将相关的过程与结果包容进来,使文化指向一种社会群体的心智取向^①和行为取向及其表达,具有共性的行为方式总是指向某种文化。[15](P744)

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布鲁克斯所描绘布波族的确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早在1964年,社会学家格雷纳(Cesar Grana, 1919—1986)的《波希米亚对抗布尔乔亚》就对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的文化特征进行了勾画。这里我们不妨先根据布鲁克斯的描述和他对格雷纳的引述,把布尔乔亚和被希米亚的基本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由于布鲁克斯所谓“喜剧社会学”的特点,他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来比较两者的文化特征,但根据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表述特别是关于消费的讨论,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层面来进行讨论。

在文化上,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所谓的布尔乔亚就是经济学家们眼里的人类——经济的动物。对于布尔乔亚而言,积累财富是他们人生的目的,表现财富是他们的人生表达。对物质和财富的追求就是要在形式上建构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群体,也因此构成了他们的文化特征,即把自己所有内在的或外在的特质用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物质的所有属性都要归结为可以用货币表达的价值,没有货币价值的物质是没有意义的。

所谓的波希米亚就是文学家们眼里的人类——亲密的动物。对波希米亚而言,展示精神是他们人生的目的,表现精神是他们人生的表达。对精神独立的追求也要在形式上建构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群体,也因此构成了他们的文化特征,即把自己所有内在的或外在的特质用表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他们而言,任何物质本身都没有了货币价值,其全部价值就在于它的表意性,长头发、胡子、非洲工艺品等等都只不过是表达的工具而已。

正如布鲁克斯在书的“引言”中表述的那样,

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是那些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人。他们捍卫传统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观。他们在大公司上班,住在郊区,礼拜天会上教堂。另一方面,波希米亚性格的人则是那些藐视传统的率性任

^① 在一般的意义上,价值观念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述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取向,同时,价值观念在中文里也更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为了避免后者,这里我采用了“心智取向”来表述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

情者。他们不是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反正就是嬉皮士一族和垮掉的一代。[3](引言)

当然,尽管在我们把文化与阶级相联系的时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阶级究竟是文化的使用者还是文化的产物[14](P37),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文化的特征绝不仅仅在于文化本身,而是指涉了由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状态,正如威廉姆斯指出的那样,文化指涉了政治与社会关系,代表一种整合性的尺度,成为“诠释我们一切共同经验的一个模式,而且由此诠释而成为我们的共同经验的改变模式”[13](p xviii-xx),变成了整个生活方式的象征^①

而“现代种种意思里的文化,其观念起源于工业革命时代”[13](pvii)。工业革命的直接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制造了一个通过追求物质财富而兴起的阶级——布尔乔亚。当他们取代贵族阶级权势的时候,也取代了贵族阶级对潮流的主宰,成为社会潮流的代表。

客厅的流行正是出现在这样的时代,“事业有成的商业人士希望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够反映出他们的品位和文化偏好”,他们不认同知识分子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我本人同意一个人偶尔可以读诗以自娱,或者还可以增长语文能力,不过就仅止于此而已”,因为“鱼和客人两者都是过三天就会臭掉的东西”。[3](P64)这样,客厅对住房其他空间的占领决不仅仅是像布鲁克斯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展示布尔乔亚的“心智活动空间”,或是为了“创造一个高尚的环境,让人们培养和展现敏锐的感性和高雅的兴趣”。[3](P63)也不仅仅是像布什曼(Richard L. Bushman)所说的,拥有客厅的人是要对外宣称,比起粗俗鄙陋的大众来,他们住的更为高尚、过得更有品位,而是要由此来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等级,用布尔乔亚的行为取向来标示这个阶级的存在界限。

在这样的意义上,客厅的出现和流行与其说是为了表达布尔乔亚的高雅,还不如说是客厅的主人们为了利用接待客人的机会来展示客厅空间的货币价值。一如在有着众多贫穷人口的时代,宠物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爱护动物和表达个人的教养,还不如说是宠物的主人们为了炫耀由宠物

的稀缺性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不仅如此,类似的财富的物质或货币表达尽管说明财富占有的差别,但不能说明阶级的差异,一个满屋子堆着金砖的富人并不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因为财富的物质化或货币化与阶级的重要关联在于获得财富方式的差异。只有当两者的差别都显而易见,阶级的文化表述才变得完整。这就是凡勃伦所说的服装文化的社会意义。

如果从衣着上除了能够证明穿的人财力优厚,可以任情花费以外,还可以证明他(或她)并不是一个要依靠劳动来赚钱度日的人,衣着作为社会价值的一种证明的作用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对于一般所认为优美的那类服饰加以仔细考察以后就可以看出,设计者在每个细节上的用意是在于要引起一种印象——穿着这类衣服的人并不习惯于从事任何有实用的劳动。如果在服装上显露了穿的人从事体力劳动的痕迹,或者有了污损,不用说,这样的衣服是谈不到优美,甚至也谈不到合适的。[16](P124)

貂皮大衣之所以优雅,不仅是因为它稀有,还因为穿着这样衣服就意味着脱离了体力劳动,钻戒之所以显示身份,也是如此。这样,审美标准成为了阶级文化特征的集中表现。如果说人的心智取向需要借助物质才得以表述的话,那么对物质的审美偏好不仅展现了心智取向的核心内容,也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我们看到,布鲁克斯也注意到了由高雅所引申的审美问题[3](P63),并特别引用了英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观点,“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什么美的东西不是光滑的……随便一个美的东西,如果表面是粗糙的,不管它在其他方面有多么美好,总是让人失去了那份美感”,借此来说明在布尔乔亚新生的时代,这种审美标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是让“客厅阶级”能够在社会大众之中鹤立鸡群。

工业革命的另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让依附于贵族阶级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摆脱依附成为了自由的社会成员。不过身体的自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多的快乐,因为他们仍然需要用自己的

① 由此看来,布尔迪厄关于文化与阶级的关系的讨论只不过是这个命题的操作化和实证化而已。事实上,在布尔迪厄的论述中,无论是关于必需品与文化的关系,还是关于非必需品与文化的关系,都意在强调阶级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强化关系,即由阶级所消费的文化 and 由文化所区隔的阶级之间的关系。而在本质上,并没有离开威廉姆斯观点的核心。

劳动来维持生计,而新的、将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的方式既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也不是他们所愿意接受的。人类对基本生存物质的追求胜过对精神的追求和对今天我们所定义的纯粹消费物质的追求使得波希米亚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创意来获得财富,在布尔乔亚因其财富的积累而渐渐穿上历史舞台主角戏袍的时候,波希米亚仍要为生计发愁,不然舒伯特(Franz Schubert)所深爱的女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嫁给了一个面包师呢?

波希米亚的痛苦就在于他们没有布尔乔亚的财富,却又不甘像劳工阶级那样生活。换句话说,他们不认同物质主义的心智取向,却又不得不生存,而任何形式的生存都离不开物质基础。波希米亚内在的张力使他们认为所有不幸的来源在于布尔乔亚对物质的追求,为此他们把自己的愤怒直接投向了那些依靠机械性的敲敲打打而娶走了他们深爱女人的布尔乔亚,骂他们“让人作呕”(司汤达),骂他们虽然“勤劳,但也贪得无厌”(福楼拜),骂他们“沉溺在脂肪堆里”(左拉),进而形成了一种与布尔乔亚的直接对立,“诅咒他们的家族和社会,诅咒他们的家园和城市,诅咒整个国家”(缪塞)。

诅咒并不能使自己既区别于依靠物质财富占据社会主流的群体,也不能使自己区别于屈服于物质主义却仍然在物质财富的阶梯上缓慢爬行的劳工群体,能够使自己区别于二者的还在于用自己的物质去诋毁他们的物质,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诋毁他们的审美标准。从格雷纳那里,布鲁克斯概括了他们的反物质主义的物质和他们自己的优雅。鲜艳夺目的服装与身体装饰,年轻的和新潮的艺术形式,是他们反物质主义的物质;刺激的事物、长发和胡子是他们的优雅,不为人所知的、原始的、自然的非洲工艺品、遥远中国社会的习俗等是他们的审美标准;性爱是他们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艺术的源泉。当然,这些反物质的物质、优雅和审美标准,不仅使他们站到了物质主义的对立面,也昭示了他们不是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的装束也是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鲜艳的服装一如貂皮大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已经标识自己的阶级。[17](P230-248)波希米亚用自己的创意建构了一个独立于布尔乔亚和社会大众之外的阶级,尽管他们同情布尔乔亚下的牺牲者,如穷人、罪犯、流浪者。这就是格雷纳所归纳的,做庄严的流浪汉胜过做富裕的臭虫。

事实上,广义的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对立根源于经济活动的区隔,但并不止于经济活动,而是从经济活动出发把区隔延伸到了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离开必需品的客观距离增加时,生活方式就逐渐转变成了韦伯所说的‘生活方式风格化’的东西,这是一种信奉,能够引起和产生多样化的生活实践,从葡萄酒到奶酪的选择、到节日期间的房屋装饰”[1](P55-56)。

简而言之,对物质和财富的推崇使得对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追求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并把物质主义的布尔乔亚推进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使以物质主义为信仰的文化表达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波希米亚对精神和创意的追求沦为了物质主义社会的边缘,他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定义与努力,形成了与物质主义的对抗和对同样是物质主义的、但却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的同情,并使反物质主义的文化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必须注意的是,历史上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的对抗并非竞争意义上的对抗,而是强势与弱势间的对抗,波希米亚始终是物质主义社会的弱势阶级,布尔乔亚似乎很少将波希米亚当作自己的对手。《布波族》第二章描绘的布波之间的激烈对抗,事实上,只是布鲁克斯“戏剧社会学”的黑色幽默而已。与其说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之间在工业化时代有过一场全面的战争,还不如说是波希米亚一方的战争,正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状况一样。

四、隔代之愈:创意的物质化 与文化融合

如果用布尔迪厄的观点来历史地看,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之间虽然有阶级的和文化的冲突,但冲突基本的来源还是经济因素。即使一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布尔迪厄的分析并不完整,他忽视了对阶级之间价值观来源的差异性以及文化差异的多样性[14](P209-210);或者又如批评者指出的,布尔迪厄的分析没有区分公共领域与私性领域,也没有区分与阶级有关和无关的文化,但他的经济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断并没有受到颠覆性的质疑。

问题是,是什么使得经济与文化之间形成了“联系”,并且构成了阶级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强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还应该回到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对抗上来。知识分子与银行家的历史并

没有给我们展现一幅两者正面冲突的画卷,倒是“茶叶蛋”和“导弹”之间的虚拟张力说明,与其说两者之间是阶级的和文化的对抗,还不如说是物质化来源之间的对抗。工业时代物质生产是把自然资源如矿藏、石油、水资源等转变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物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布尔乔亚占据了自然资源利用的先机和优势,而波希米亚的创意却只能在物质化的主流外被欣赏和被玩味。除此以外,夸克认为,在本质上,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也有共同的地方。

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并不总是水火不容,事实上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他们都想获得(前者想获得物质,后者想获得经历),他们都是激进的个人主义者(前者是激进的功利主义者,后者是激进的表现主义者),他们都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作获得审美结果的工具(所不同的只是目的的细节以及对意义的取舍)。因此,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实际上是一对共生体:波希米亚是布尔乔亚社会制度的寄生虫(两者互为敌人,又互为资源),布尔乔亚把波希米亚作为一种烘托来栽培,对布尔乔亚而言,波希米亚既是出气的对象,也是可以开发的市場。[11]

尽管如此,我们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就“合流”了?舒伯认为,透过历史看去,任何时代的精英“永远都是智慧与审慎的,而不仅仅是消息灵通或者仅仅是有好的SAT(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7]。布鲁克斯所说的所谓《纽约时报》婚庆版的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实际上是一场知识精英的革命。而在我看来,所谓知识精英的革命倒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因为信息社会的发展凸现了这样的革命,否则嬉皮士运动永远也只会被视为波希米亚的又一次反叛,或者是对他们前辈的效法。[3](P68)因为根据吉尔茨的逻辑推演,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之间的文化冲突应该是传承的。[2]

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在布波族身上没有出现,是因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把波希米亚的创意变成了布尔乔亚财富的来源。布鲁克斯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他在《布波族》的“引言”中说

在这个年代里,创意和知识至少和自然资源与金钱资本对经济上的成功是同等重要的,信息的无形世界和金钱的有形世界彼此融合,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的新名词如“智慧资本”和“文化产业”都成了当红流行的语录。所以,在这个时代能够崛起的人就是那些可以把创意和情感转化成产品的人。这些高学历的人一脚踏在创意的波希米亚世界,另一脚踏在野心勃勃和追求世俗成功的布尔乔亚领域当中。这些信息时代的精英分子是布尔乔亚的波希米亚人。[3](引言2)

工业社会的发展到20世纪的60年代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人类依靠组织的方式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的模式似乎也走到尽头。怀特的《组织人》要说的就是这种物质生产方式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并因此呼吁人们要同组织作斗争。不过很快,人们就看到了并非因为人们同组织的斗争所产生的后果,即高度组织化的制造业岗位数量的下降和个性化的创意性岗位数量的上升。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资料^①,20世纪70—90年代,在劳动总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农业从业人口下降了100多万,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从4%下降到了3%;工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从33%下降到了24%;服务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从63%上升到了73%,而失业人口的比重一直在6%左右波动。在全部非农产业从业人口中,制造业从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从50年代的32.5%下降到90年代的15.3%;与此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从12.7%上升到了28.7%。卡斯特也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就业结构转型,即传统制造业在整个从业结构中越来越多地让位于信息处理和服务业[18](P246—385)。

而在所有新兴的职业中,传统的积累财富的方式也已经过时。弗里格斯坦(Neil Fligstein)的研究表明,从1919—1979年间的60年,大型企业内部的权力从资产所有者的企业家转移到了营销总监的手中,随后又逐步转移到了财务总监之手;传统的所有者式的财富积累从20世纪上半叶后期开始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高级职业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专业服务人员式的财富积累,他们用创意和知识使自己成为

① 参见美国劳工部网站: <http://www.bls.gov/>。

了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在1989—1995年间净增的660多万个薪酬岗位中, 3/4以上的是高收入的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位。一如经济学家赖克(Robert Reich)所言, 我们已经从工业生产转向了符号生产, 从物质经济转向了主意经济。而所谓的高级经理人、高级专业服务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获得收入的资本不是别的, 正是被上一代布尔乔亚不屑的创意和知识, 也是布鲁克斯所说的高学历。于是,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群人。

喜好鉴赏葡萄园的医生、会写小说的律师、身为园艺迷的大学教授、异常爱好文学的不动产经纪人、挂着耳环的心理医师和其他那些信息时代的世界公民们。这些人想要的不是老掉牙的乡村俱乐部和喝着马提尼酒的市郊生活, 而且想要的很自然地希望他们的理想能够反映在他们所买的东西和他们所透射出的形象上面。购物或许不是世界上最需要花脑筋的活动, 不过却能反映出文化的状态或水平。[3] (P61)

由此看来, 布鲁克斯的布波族与他们的长辈或布尔乔亚或波希米亚并没有什么关系, 既没有血缘关系, 也没有业缘关系, 也不是伟大的黑格尔式的综合体。[1] 虽然他们躺在了布尔乔亚的温床上, 但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后代; 虽然他们具有波希米亚的敏感、批判性和个性, 但他们也不是流浪艺术家的后代。他们是另一个社会遴选机制的产物, 他们将自己的所有创意智慧职业化为可以交换的产品, 这才有了今天所谓的教育的产业化、影视的产业化、媒体的产业化、艺术的产业化、资讯的产业化、创意的产业化等等。换句话说, 新精英阶层是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意的物质化建构的, 他们与布尔乔亚相同的不过是财富, 与波希米亚相同的不过是创意, 但这所谓的相同都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社会背景, 催生这些变化的不是别的, 正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 80年代加速的信息社会的发展。

那么新的遴选机制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用考试分数取代家庭出生。考试遴选与出生遴选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的更替性和后者的继承性。新的遴选机制决定了所有人都有机会从考试中脱颖而出, 同时, 所有通过考试所获得的一切都将无法向下传递, 而必须由新的考试过程所替代, 这是中国文化中让人再熟悉不过的部分了, 所谓“富不过三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考试机制所产生的社会

现象了。通过考试的人非常清楚分数是不可向任何方向传递的, 分数是属于自己的, 是属于现世的。同样, 由分数所带来的一切也都是自己的和现世的。

正因为如此, 炫耀在社会的层面就失去了意义, 在实用主义锤炼的社会里, 在没有金钱短缺压力的条件下, 对现世的、实用意义的追求胜过了任何对传世的追求。对于布波族而言, 纯粹的财富或者精神追求都不是他们人生的目的, 纯粹的财富或者精神表达也不是他们的文化诉求, 他们两者都要。不过, 他们既不用奢华来表达财富, 也不用叛逆来表达精神。对他们而言, 奢华和叛逆是粗俗和幼稚的同义词, 所谓的“细致、优雅、体面、端庄”, 只是布尔乔亚的虚荣, 所谓的“各色、新奇、刺激、亲密”, 也只是波希米亚的无病呻吟。只有“真实、自然、温暖、简朴、简单、诚实、有机、舒适、手工、独一无二”[3] (P85)才是他们的品味。在这样的品味里, 财富是信手拈来的, 精神是水到渠成的, 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文化特征从有形的区隔变成了无形的融合。

我在这里使用“融合”, 是想说明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冲突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而今天所谓的布波族既不是出自对立时期的布尔乔亚, 也不是出自波希米亚, 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社会来源与经济特征的社会阶级, 他们与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不同时代, 又因为时间的原因, 使其脱离了布波之间历史的纠葛, 并可以任取布和波的文化特征来标示自己的阶级存在。实际上在吉尔茨的传承意义上, 布波族与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根本就没有关系。隔代无仇, 是因为他们之间原本就没有仇恨, 而表面上看起来的布波合流只不过是一种快意的想象而已, 所以“融合”更加实际地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换句话说, 布鲁克斯在书中把这个新生的上层阶级与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联系起来, 让读者在三者之间建立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各种联想, 无非是玩了一套美国人喜欢的、大卫式(David Copperfield)的大变活人魔术而已。有意义的是, 三者之间的比较让我们看到了创意的物质化所产生的影响并再次看到了文化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五、结 论

把文化与阶级联系起来虽然早有文献, 但详细的论述还是由布尔迪厄完成的, 他没有单方面

强调阶级或文化对另一方的决定性影响,但却明确地指出了文化作为阶级意识表达和认同的标识,是符号性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吉尔茨在研究印尼巴厘岛人生活的时候,就提出了文化传承中的意义和符号问题。如果我们重读威廉姆斯60年代关于文化概念历史演变的考证,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命题,即作为群体心智取向和行为取向的文化,总会以一定的方式进行表达,而具有群体符号和意义的文化与其所在阶级之间会表现为相互强化的关系,并通过意义和符号系统进行传承。

布鲁克斯的《布波族》虽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却为讨论这样的命题提供了极有潜力的思路。他把曾经对立的两个阶级放在一起,认为新精英阶层(即布波族)分别从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那里继承了他们的优良文化,并形成了这个新上流阶级自己的文化。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与上述命题相悖的问题:如果文化的传承可以超越历史的仇恨,那么符号与意义的传承就失去了意义,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失去了文化意义。

社会共识与经验资料都表明,在美国社会的确存在一个依靠知识而兴起的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贝尔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此后的时间里不仅贝尔一再强调自己的观点,其他的社会学家如图汉(Alain Touraine)、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等也加入其中,卡斯特更是详尽地阐述了由这个新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布鲁克斯只是用“喜剧”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新上流阶级而已。尽管如此,“喜剧”背后的问题是令人玩味的。

历史地看,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其说是对等阶级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一场单边战争,因为布尔乔亚似乎从来没有把波希米亚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布尔乔亚开放和开明,他们甚至愿意接受波希米亚的部分风格,倒是波希米亚显得狭隘和极端。

[3] (P74)而这种不对称的对抗不是来源于群体的大小、意识形态的对立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些都是冲突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冲突的本质。冲突的来源和本质在于工业化开始之后的物质化基础的变化,布尔乔亚利用自然资源,依靠敲敲打打和斤斤计较以及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为社会生产了无尽的物质产品,也为自己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并因此登上了权力的高峰;波希米亚的所谓创意和知识,却被边缘化为只能让人欣赏的消遣对象,一个卖茶叶蛋的文盲是可以消遣一个造导弹的教

授,如果不服,教授也尽可以去卖水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象在欧洲和美国的史中也有长长的记录。

依靠自然资源的物质生产的极限性,导致了物质化基础的历史性变革。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产业的发展逐步把创意和知识变成了人类社会物质化生产的基础,能够为人类带来新“消费”的,正是那些曾经被布尔乔亚边缘化的波希米亚群体。不过,今天的波希米亚已经远不是制造文化对立时期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勤奋获得知识,用自己的创意为人类制造惊奇,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和创意都变成了物质化的基础,并因此在不经意间就获得过去的布尔乔亚需要耗费毕生精力都得不到的财富,因此他们厌恶把财富作为炫耀的资本,也厌恶为了财富而不择手段。当然,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的财富可以传递,但获得财富的知识和创意是不能传递的,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考试的基础上获得的,这种社会对新精英遴选的现世性使他们重视在世的感受与快乐,又绝不愿意与浅薄的奢华为伍。这就造就了布鲁克斯所说的布波族的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特征。必须澄清的是,这样的文化特征决不是舒伯所说的人类永恒人性的现代表现^[7],也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布波文化就是布波文化。

对于一个有着近二千年考试遴选制度的国家来说,我们对于传承的概念已经内化为行为准则的一部分了,而早在考试制度开始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根据经验建立了自己的“财富”观。春秋时,孙叔豹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即所谓君子有三立。今天的布波族虽然已经抛弃了布尔乔亚的极端功利和波希米亚的极端酸腐,并试图追求道德完美和行为约束,但他们似乎还没有能力理解中国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德、功、言三者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IERE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3] [美]大卫·布鲁克斯. 布波族: 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2.
- [4] METCALF, ROY. Lo, the Poor WASP [J]. *Social Policy*, 2000 Winter, pp. 55-59.

- [5] WOLFE, ALAN. The Greening of Conservatism [J]. **The New Republic**. 2000 June 12, pp. 39—44.
- [6] WAVRIN, CHRISTOPHER. Bourgeois bohemians [J]. **Insight on the News**. 2000 June 19. p. 30.
- [7] SCHAUB, DIANA. Bobos in Purgatory[J]. **The Public Interest**. 2000 Fall pp. 104—109.
- [8] FIRESTONE, RANDALL S. Prospects for an American Gandhism [J]. **ReVision**. 2001 Vol. 24. NO. 1. pp. 20—28.
- [9] STEVENSON, RICHARD W. 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N]. **The New York Times**. 2000 June 18 p4 4. p
- [10] BELL, DANIEL. **The End of Ideology**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1] QUIRK, MICHAEL. Ghosts, Monks, and Bobos[J]. **Cross Currents**. 2001 Fall pp. 405—419.
- [12] [英]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M]. 郑戈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3] [英]威廉姆斯(Williams, Raymond). 文化与社会: 1780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M]. 彭淮栋译. 台北: 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1985.
- [14] [美]约翰·R. 霍尔·玛丽·乔·尼兹. 文化: 社会学的视野[M]. 周晓虹, 徐彬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5] FINE, GARY A. Small Groups and Culture Cre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Vol. 44. 733—745.
- [16] [美]凡勃伦. 有闲阶级[M]. 蔡受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7] [美]马歇尔·萨林斯. 文化与实践理性[M]. 赵丙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8] [美]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Beyond Conflict: How Bobos Is out of Bourgeois and Bohemian in Culture

QIU Ze-qi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ourdieu argued that class and culture are inter-strengthened, while Geertz concluded that culture is transferred one to another generation. Logically, conflicted two classes would not become reconciled. But Brooks gave a count-example and argued that Bobos come out of Bourgeois and Bohemian, they antagonized in more than 200 years. This paper argued that neither Bourdieu nor Geertz missed the variable of social-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class and its culture. When we take the variable into account, Bobos become a new class that has not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either Bourgeois or Bohemian therefore has no conflict inter-strengthening and no conflict transferring down.

Key words: Culture; Culture conciliatory; social-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Bobos

(责任编辑 何方)